

抵抗与艺术：群体性事件的公共修辞机制探析

刘 涛

摘 要：公共修辞是一个与个体修辞相对应的概念，核心强调以公共利益为根本诉求的话语构造理念。通过对2010年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文本分析研究发现，具有公共修辞特征的网络流行语在形式修辞和意义修辞两个话语维度上积极延伸，体现的是一种间接的、迂回的、赌博式的、偷袭式的政治抵抗艺术。而在视觉文化时代，公共议题的呈现与建构更多地依赖于图像化的表征方式，公共修辞的“图像转向”成为一个亟待进一步探讨的媒介命题。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公共修辞；流行语；形式修辞；意义修辞；图像政治

作者简介：刘涛，男，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西北师范大学 影视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甘肃 兰州，730070）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1) 05-0009-07

美国哲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在《一个核心的哲学》一书中指出，语言是人类所创造的特有的象征体系，而人是依靠象征而存在的动物，象征是人们构造社会关系的基本话语途径。相应地，贯穿着语言运用的一切人类活动本质上都意味着一种象征性实践。所谓象征，强调通过有意识、有目的地使用特定的语言符号来达到最有效的传播效果。修辞（Rhetoric）是借助象征的手段去表达或发现指涉对象不在场、或者事物缺失状态下的意义，进而以一种“象征的力量”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以此影响人们的认知与行为。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被认为西方修辞学的奠基之作，他将修辞界定为“一种能在任何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法的功能”^[1]。

当代西方修辞学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语言学的选词、择句、文采、辞格等范畴，而成为哲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非常重要的研究话题，甚至直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或专业。这是因为，不同于中国传统修辞观念中对于遣词造句和修辞规律等语言使用技巧的刻意追求，西方修辞学发端于以公共演讲为代表的演说术（oratory），更多地强调一种思维方式的选择和传播，修辞的核心功能就是劝说。索加·福斯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哪里有劝说，哪里就有修辞；哪里有意义，那里就有劝说。”^[2]丹尼·卡瓦拉罗（Dani Cavallaro）则进一步指出，语言的使用过程意味着一场象征交换的行为，所有的语言符号最终都是比喻，哪怕是最简单的事实表述，也隐含了潜在的修辞动机。^[3]帕特里夏·毕泽（Patricia Bizzell）和布鲁斯·赫茨伯格（Bruce Herzberg）在《修辞传统：从古典到现在》一书中反复强调，当代修辞学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修辞格”和“演说术”，而是涵盖“劝说”、“劝说效果”、“语言运用”、“公共动员”、“有效的演说策略”等范畴。^[4]正是在这一范畴转向中，公共修辞（public rhetoric）作为一个关键概念引入传播学话语体系，它成为一个围绕公共性而展开的媒介动员技术和话语修辞技术。

首先对西方公共修辞和东方个体修辞进行概念梳理和意义诠释，进而以中国2010年的群体性网络

事件为核心分析文本,探讨当前社会普遍流行的公共修辞技术,并进一步对其影响效果进行分析。

一、西方公共修辞与东方个体修辞

何谓公共修辞?1988年,罗伯特·伍斯诺(Robert Wuthnow)在《传播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作为公共修辞的宗教话语》一文,论文第一次提出“公共修辞”这一个术语。他致力于探讨宗教话语成为公共话语的修辞秘密,并且将这种话语构造方式称为公共修辞。按照伍斯诺的观点,宗教话语以公共利益为修辞对象,通过对政治话语范畴中有关“自由”、“权利”等概念的激活与招募,进而巧妙地进入公共领域,成为一种人们可以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公开谈论的合法议题。随后,有关公共修辞的传播学研究不断升温,公共修辞所关心的核心命题是:一种话语、一项议题、一个事物是如何进入公共领域,又是如何达到话语劝服与认同构造的神话目的?具体来说,凯利·里特(Kelly Ritter)从公共修辞的视角探讨“学生评教话语”(RMP)对整个教育评价生态的深刻影响,^[5]布伦顿·费伯(Brenton Faber)聚焦于纳米科学话语合法化生产的公共修辞机制,^[6]朱迪·西格尔(Judy Z. Segal)指出各种商业和医学话语借助一定的公共修辞策略制造了一个个对乳腺癌漠不关心的沉默者,^[7]科琳·凯利(Colleen E. Kelley)核心探讨戈尔巴乔夫政府对裁军计划的公共修辞与社会动员策略^[8]……

随后,一大批专门聚焦于公共修辞研究的著作相继问世。比如艾琳·尤雷特(Irene Eulriet)的《军队中的妇女:公共修辞与性别政治》,芭芭拉·库齐(Barbara Couture)和托马斯·肯特(Thomas Kent)的《隐私、公众与出版:私人生活与公共修辞的统一》,菲尔·麦克纳顿等(Phil Macnaghten, et al.)的《可持续性环境战略的公共修辞:矛盾与效果》,葛雷格·巴恩黑索(Greg Barnhisel)的《媒介与信息:公共修辞的策略与读本》等。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归纳与总结,我们可以将公共修辞的概念简单概括为:公共修辞是一种有关公共话语的构造与生产方式,一种有关劝服与认同的话语构造艺术,它以话语的方式进入公共领域,进而在公共话语框架内达到公共议题建构以及公共政策制定的政治目的。

公共修辞是一个与个体修辞(individual rhetoric)相对应的概念。纵观东西方修辞学的发展范式,二者形成不同的修辞传统:西方修辞主要强调公共修辞,本质上对应于公共话语生产与传播的公共传播秩序;东方修辞更注重个体修辞,实际上对应的是以帝王、君主为核心的集权传播秩序。所谓公共修辞,主要指以公共利益为根本诉求的修辞行为,它的根本目的就是激活公民的公共参与意识,即公民通过对自身权利的有效识别与认同而积极参与到公共议程之中,进而保障公共事务决策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有序进行。由于公共修辞起源于古希腊城邦社会的公共演说传统,它不可避免地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市民社会基础和公共参与秩序是公共修辞传播得以发挥作用的基本保障,“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公民就不大可能被赋予充分的言论自由权利,也就没有进行公共演说的可能,公共意志的表达、统一就不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9]

反观中国传统社会,社会事务的解决往往直接诉诸集权或暴力,所谓的公共意志从来都是一个伪命题。个体如果要参与社会事务,其修辞对象必须指向君王,而春秋战国以后因言获罪者不计其数,所有这些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缺乏产生公共修辞的政治土壤,这也注定中国传统修辞研究更多地聚焦于个体修辞。所谓个体修辞,主要强调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的修辞行为。由于缺乏言论自由表达的制度保障,个体修辞的信息权利注定是不平等的。换言之,不同于公共修辞所强调的公共意志的自由的、平等的双向网状传播,个体修辞主要指个体意志的单向线性表达,个体利益是这场修辞的终点。从修辞动机而言,个体修辞是对个体利益的规划与追求,本质上是为了个体的安身立命,而非服务于更崇高的政治参与目的或公权力监督目的,更谈不上在制度与律法层面进行长期的、持久的规划和建设。

个体修辞和公共修辞并不是两个完全冲突的概念，而是作为两种共时性的修辞形态存在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和传播秩序中。中国有句古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个体意志与公共意志之间的对话关系。纵观当前的新闻叙事框架，故事化叙事已经成为一种最基本的新闻编码策略，个案与主题、故事与制度、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叙事逻辑正好是个体修辞与公共修辞之间对话关系的微妙注释：个体修辞的结果或落点最终指向公共修辞。具体而言，那些被重点征用的个案、故事与命运不仅仅是对个体生命的微观关照与书写，而是作为一种修辞策略服务于更大的政治目的：从感性话语无缝过渡到理性话语，在制度建设与法律完善层面做文章，进而从根本上保障个体权利，防止社会悲剧或公共疼痛的再次重演。由此可见，个体修辞聚焦于个体自身的生命、意志、尊严、安全与权利，公共修辞则致力于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凝聚公共意志、监督公共权力、制定公共政策。二者之间的话语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个体修辞是公共修辞得以合法化表征与实施的基础和手段，公共修辞是个体修辞在公共领域中的反映，而且从根本上保障并检验个体修辞的能力与效果。

二、制造公共围观的全民造词运动

布尔迪厄在《语言意味着什么：语言交换的经济》一书中指出，社会就是一个“语言交换市场”（Linguistic Exchange Markets），语言本质上意味着一种交换性的经济资本。在社会交换领域中，语言交流就如同商品交换，说什么，如何说，无疑都赋予了语言特定的“分量”和“价值”。布尔迪厄进一步指出，大凡那些掌握“委婉表达”能力的人，往往能在这场交换活动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回报。这里所强调的“委婉表达”其实就是语言修辞，它不单单强调语言使用的规范与风格，更多地强调语言作为一种象征性实践的话语劝服能力，也就是某种合法话语构造、生产与传播的语言使用策略。正如布尔迪厄所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最好的沟通关系，也就是语言交换活动，其本身同样也是象征性权力的关系；说话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或者跟他们相关的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就是在这种语言交换活动中实现的。”^[10]布尔迪厄将语言的象征性使用所带来的利润回报称为“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这也促使人们开始精心计算这样一道算术题：为了获得最有效的利润回报，哪种语言使用能够带来溢价效果或增值效应？这一问题成为语言修辞学的核心范畴构成。

近几年，面对一个个危及公共利益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躲猫猫”、“俯卧撑”、“富二代”、“日记门”、“被代表”、“不差钱”、“七十码”、“打酱油”、“蒜你狠”、“被自杀”、“临时性强奸”等网络流行语一夜之间悄然诞生，继而疯狂传播。这些被“发明”的流行语所见证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公权力进行另类监督的姿态与途径，同样体现的是草根阶层设置并构造公共议题的能力与智慧。显然，不同于其他流行语的商业或娱乐目的，这些流行语的生产背景和修辞对象往往指向特定的公共事件，它的目的和意义就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强调对公共意志的凝练，对公共道德的伸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因此具有公共修辞的性质。

纵观转型时期的中国，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被打破，新的利益均衡机制和社会公共理性尚不成熟，这是一个问题迭出的时代，这也是为什么群体性事件频频上演。在一些突发性的重大群体性事件面前，主流话语总是搭建了一个完整的、排他性的解释体系和叙事脉络，它书写成文，布局严密，逻辑清晰，以期将底层话语推向世界的暗处，使其成为一个不在场的、无人认领的失语者。然而，正如福柯所说，“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对权力的反抗。”^[11]当主流话语对事件的界定和解释无法体现公共意志、甚至站在公共利益的对立面时，底层话语便会借助各种间接的、迂回的、游击性的、偷袭式的战术进行抵抗。这些被“发明”的流行语所体现的正是一种来自底层的亚文化抵抗艺术，它秉承了亚文化与生俱来的激进、批判、颠覆与对抗特质，即通过对主流话语的戏仿和反讽，以此传递一种另类的、在场的政治姿态。这既是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弱者的武器》中核心强调的一种间接的草根政治框

架，也是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所概括的一种普遍的弱者抵抗艺术。

通过对五大社区论坛（天涯、凯迪、强国、新浪、中华网）和新浪微博的舆情跟踪，人民网舆情检测室发布了《2010 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在前 20 大热点群体性事件中，涉及公共利益（公共权利保护、公共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公共道德伸张）的事件达到 14 个（见表 1），占到 70%。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事件之所以能成功地制造公共围观效应，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相关流行语的生产与传播。比如，河北大学李启铭醉酒驾车，撞死一名女生后试图逃逸，被拦下后嚣张地喊出：“我爸是李刚”。一句话点燃了网民积郁很久的愤怒，这是对法律正义与公共伦理的公然挑衅。“我爸是李刚”瞬间成为一个网络热词，它是对这个时代“官二代”现象的微妙嘲弄。猫扑网随即发起了“我爸是李刚”网络造句大赛，底层智慧纷纷云集，令人惊叹，唐诗、宋词、广告及流行歌曲无一不遭遇网友改编，36 万条各个版本的网络衍生词句一周时间内横空出世，例如李白版“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普希金版“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我爸是李刚”，陈楚生版“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爸叫李刚”，叶绍翁版“满园局长关不住，一只李刚出墙来”，田跃君版“前世五百年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我爸是李刚”，特仑苏版“不是每一杯牛奶都是特仑苏，不是每一个爸爸都叫李刚”等多个版本。

表 1 2010 年涉及公共利益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及流行语

事件排名	事 件	代表性流行语
1	腾讯与 360 互相攻击	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4	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	官二代、我爸是李刚
5	富士康员工跳楼	今天你跳了吗
6	袁腾飞言论惹争议	历史是什么玩意儿
9	唐骏“学历门”	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校友
10	宜黄强拆自焚事件	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12	张悟本涉嫌虚假宣传	“豆你玩”、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
13	各地校园袭童案	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转是政府
15	山西“问题疫苗”	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活
16	商丘赵作海冤案	赵作海式冤案、有多少命可以重来
17	王家岭矿难救援	丧事终于办成了喜事
18	谷歌退出中国	政治的谷歌、谷歌的政治
19	唐福珍自焚	一定要选一张我最漂亮的照片做遗像
20	部分地区罢工	鸭梨很大、压力山大

三、网络公共修辞的两种话语智慧

进一步分析流行语的生产艺术，作为一种公共修辞形式，网络流行语往往采取戏谑、讽刺、游戏、拼贴、杂耍式的修辞风格，这是后现代主义话语观念在网络世界的逼真刻写。换言之，在主流话语所铺设的微妙而敏感的话语空间内，象征亚文化抵抗行为的流行语生产本身就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修辞命题。谈及底层话语所调用的公共修辞策略，其实就是对政治分寸、话语安全、传播潜力、语义结构与修辞智慧的拿捏和把握。常见的公共修辞策略可以分为形式修辞和意义修辞，前者侧重形式上的传播

智慧，致力于增强话语本身的传播力，比如围绕特定网络事件/现象而开展的网络造词运动；后者侧重意义上的话语智慧，常常借助隐喻、象征、反语等修辞方式，强调一种迂回的、赌博式的游击战，以期在语义深度和社会动员层面完成公共议题建构的政治目的。

就形式修辞而言，一个流行语就如同一个原型符号，它会源源不断地召唤出新的组合方式，网络造句就是一种最为典型的修辞表达，它的直接目的就是制造一场不折不扣的新社会运动。具体而言，出于政治敏感与话语安全考虑，底层话语不得不对自己进行打扮和伪装，以一副看似平和而中立的姿态走入公共视野，这是一场赌博式的游击战。它幽默风趣，朗朗上口，轻盈灵活，易于传播，以一种春风化雨、无处不在的力量作用于公共领域，扮演着四两拨千斤的政治功能；它看似简单，实际上却精致、微妙、传神，一语双关，具有无穷的衍生与再造能力。比如，腾讯与360这场臭名昭著的商业网战中，马化腾在“致广大QQ用户的一封信”中称“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并称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面对这一绑架和牺牲公共利益的狂妄之举，“QQ体”造句运动全面铺开，网友借助“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来控诉各种践踏公众利益的商业恶战。一时间，迅雷、淘宝、Q币、IPAD、宝马、中国移动、广电总局等企业或机构纷纷演绎了自己的“QQ体”版本。例如蒙牛版的“QQ体”如下：“亲爱的蒙牛用户，我们刚刚做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在您停止饮用伊利、光明、完达山、旺仔、圣元、南山等产品前，我们决定在售卖给你的产品里增加监测剂，当它监测到用户胃里有其他牛奶成分时，将自动释放三聚氰胺。敬请谅解。”

新闻可以简单地分为事件类新闻和现象类新闻，形式修辞的引擎机制是公共事件，但这并非是公共意志凝练的唯一途径，其实，流行语的衍生与再造行为同样指向一系列备受争议的社会现象。相对而言，新闻事件是动态的、显著的，与之相随的是命运，是奇观，是那种悬念横生的情节剧，因此具有捕获公共注意力的先天优势；而新闻现象却是普遍的、静态的、默不作声的。由于现象是一系列事件堆积的集合，这使得围绕社会现象的公共修辞总是和特定的事件若隐若现地联系在一起，相应地，对偶、反复、排比、顶真等形式修辞方法成为其基本修辞方式。

就意义修辞而言，公共修辞的直接目的是完成公共议题的建构，这客观上需要在语义表达层面能够有所指涉，即首先搭建一种公众便于识别的公共话语框架，将事件/现象置于其中，并进一步在制度与法律层面寻求根本性的解决途径。由于中国当前的公共传播秩序极度脆弱，而且缺乏西方公共修辞所要求的市民基础和演说传统，这注定了当前中国公共修辞的核心内容是有关话语安全与安全传播方面的政治智慧。

纵观当前网络流行语的意义修辞特点，更多的是以一种“去政治化”的方式来传递自身激进的、批判的政治姿态，尤其是当公共利益遭遇权力压制或绑架，公共修辞的基本话语智慧可以概括为一种游戏式的、赌博式的防守反击策略，也就是在主流话语已有的修辞图景中寻找其破绽和漏洞，然后通过隐喻、双关等修辞方式证明其荒谬性与不合理性，其中最普遍的一种意义修辞方式是基于“拿来主义”的“借巢孵卵”策略。具体而言，很多流行语都是直接摘自当事人语录本身，这些语言识别性强，高度凝练，无需加工便可直接传播，比如“杀人为生”、“我爸是李刚”、“我是打酱油的”、“弹钢琴重复性动作”、“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随便叫个局长就可以收拾你，让你下岗”、“我当书记时就是希望你们喝西北风”、“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再比如“七十码”、“俯卧撑”、“躲猫猫”等流行语直接来自官方对事件的解释用词，而这些文字一旦进入传播场域，便具有了四两拨千斤的神奇功力。

不难发现，正如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的躯体内部孕育产生一样，基于公共修辞的流行语以一种“陈述事实”的合法姿态伪装自己，通过对其母体（matrix）和语境（context）的反抗而制造公共话语，以此对主流叙事的合法性发起挑战，这正是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所谈到的大众文化普遍的政治

抵抗艺术。换言之，流行语正是在“被统治和被控制的社会缝隙中作用……它本质上是防御性的，拒绝自己被社会秩序所控制，有的也暂且与之合作，还总是乐于抓住一个机会打一场游击战，作一次赌博式的战略抵抗”。^[12]因此，这些精心设计的修辞言语无一例外地在强化自己的政治姿态，即“通过自己的言辞使一个团体获得特定的意志、计划、希望和前途”^[13]。这个团体就是被主流叙事所放逐的、或者被主流话语所压制的草根阶层，他们借由对公共意志的凝练而成为一个新势力，同样借由对这些流行语的识别而完成对自我主体身份的认同，以此来建构阿尔都塞所说的个体与世界之间的想象性关系。

四、结语：公共修辞的“图像转向”

网络公共修辞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群体性事件产生并发生作用，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修辞主体（尤其体现为底层话语）通过对特定流行语和图像的发明、生产与传播来制造公共围观效应，使其成为一个公共事件，最终借助舆论的力量实现对公权力的监督以及公共政策的修订。纵观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很多问题之所以能得到正面解决，是因为以公共利益为根本导向的公共修辞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视觉文化时代，公共议题的呈现与建构方式更多地依赖于图像化的表征途径，凯文·迪卢卡（Kevin Michael Deluca）所谈到的“图像政治”（image politics）^[14]作为一个重要的媒介命题被推置幕前。比如，通过分析当代社会政治修辞的演变轨迹，凯思林·霍尔·杰米逊（Kathleen Hall Jamieson）发现，视觉修辞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公共话语空间构建的主要修辞手段——“戏剧性的、易溶性的、视觉性的瞬间正在取代建立在记忆认知机制上的文字符号。”^[15]换言之，相对于语言文字的话语建构效果而言，图像在与受众的心理互动中更具备“意义生产者”（Meaning Makers）的劝服力量，这是因为“视觉信息完全赋予了争议生产的另一个维度：戏剧性和作用力”。^[16]

图像，首先诉诸感性刺激，它逼真、鲜活、耐人寻味，往往图说世相，而且画外有“画”，具有激活公共围观趣味的先天优势。此外，图像可以自由地避开审查，这使得它具有了文字不可比拟的政治安全特质，因此具有强大的传播力。比如，在厦门PX事件、南京梧桐树事件、番禺垃圾焚烧事件、广州太石村事件、温州钱云会事件等群体性事件中，传统媒介在各种政治压力下集体失语，与事件相关的敏感词一夜之间消失殆尽，而与事件相关的各种图像符号则突破重重封锁，最终演化为一场指向公共理性构建的新社会运动。更重要的是，流行语虽然具有积极的社会动员力量，可是最终往往暧昧地纠缠于政治与商业之间，当“给力”等流行语接受政治接管后，诸如“我爸是李刚”“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等造句运动本身演化为一场象征狂欢与仪式的商业行动。相反，图像却可以最大限度地抵抗外部意义对画框本身的暴力入侵，在抵御政治改造和商业收编之路上走得更远。可见，正因为图像取代了文字而占据了话语建构的中心位置，社会争议和公共舆论的生产方式呈现出威廉·米歇尔（William J. T. Mitchell）所说的“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17]，公共修辞的“图像转向”同样成为一个亟待深入探讨的媒介命题。

纵观那些真正推动中国法制化进程的群体性事件，它们之所以能够促进法律修订与制度变迁，除了语言修辞的积极作用之外，图像在其中扮演着非常积极的修辞功能。孙志刚事件、余祥林事件、躲猫猫事件、雷闯维权事件、宜黄自焚事件、牙防组认证事件之所以能够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图像事件”的社会动员方式完成公共议题的建构以及公共话语的生产。正是通过对图像符号的有效挖掘与意义生产，这些事件得以在以公共利益为根本话语导向的修辞图景中进行裂变传播，最终成为一个时代集体关注的公共事件，成为能够激活公共围观趣味的新闻奇观，成为剑指社会公共矛盾的图像事件，成为各种声音展开论争、对话与协商的“话语性场域”（福柯语）。

参考文献：

- [1] 亚里士多德. 修辞学[M]. 罗念生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3.
- [2] Foss, S. K. , Foss, K. A. , & Trapp, R.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Rhetoric. Prospect Heights ,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1985;161.
- [3] 丹尼·卡瓦拉罗. 文化理论关键词[M]. 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8-29。
- [4] Bizzell, P. , & Herzberg, B. (2001). The Rhetorical Tradition; Readings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 2nd ed. ,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1.
- [5] Ritter, K. E - valuating learning; Rate My Professors and public rhetorics of pedagogy, Rhetoric Review,2008,27(3):259-280.
- [6] Faber, B. Popularizing Nanoscience; The public rhetoric of Nanotechnology, 1986 - 1999.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06,15(2):141-69.
- [7] Segal, J. Z. Breast cancer narratives as public rhetoric; Genre itself and the maintenance of ignorance. Linguis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2007,3(1):3-23.
- [8] Kelley, C. E. (1988) . The public rhetoric of Mikhail Gorbachev and the promise of peace. Western Journal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1988,52(3):321-334.
- [9] 陈汝东. 论人类传播秩序——一种比较修辞学视角[A]. 关世杰. 人类文明中的秩序、公平公正与社会发展[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75-585.
- [10] Bourdieu, P. Questions de sociaology.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80:144.
- [11] Foucault, M.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4:258.
- [12] 约翰·菲斯克. 解读大众文化[M]. 杨全强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7.
- [13] Bourdieu, P.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Trans. by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191.
- [14] Deluca. K. M. Image politics; the new rhetoric of environmental activism. Mahwah, NJ: The Guilford Press,1999:45-62.
- [15] Jamieson, K. H. Eloquence in an electronic a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speechmak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6] Blair, J. A. (2004). The rhetoric of visual arguents. In Charles A. Hill and Marguerite Helmers (Eds.), Defining Visual Rhetoric 2004:41-62.
- [17] Mitchell, W. J. T. Picture theory; 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16.